

十一月光明书榜

读书者说

从古代北京重识西方汉学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读后

□ 张西平

近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北京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北京作为元明清故都,长时间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地位,加大以北京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很自然的。欧阳哲生教授撰写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一书,就是北京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整体性研究: 矫正碎片化倾向

这几年关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性外文文献有了长足进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等相继出版;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刊物上,西方原始文献相继翻译发表。这些都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打下了基础。这些基础性文献和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为加深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欧阳哲生充分利用了这些新的翻译成果,写下了这部洋洋60万字的著作。

以个案研究为主。这样的研究有深度,有开拓性。但从整体学术研究进展来说,随着文献不断涌现,个案研究不断增加,单一的个案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发展。此时,需要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做一宏观把握,欧阳哲生的著作应运而生。该书在时间跨度上是从16至18世纪,实际上也涉及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马嘎尔尼、阿美士德访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从国别角度来看,该书研究了早期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也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北京经验,其中对在礼仪之争中的罗马教廷使团两度访华也做了专章研究。这样,该书对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记述就有了一个整体性把握。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是一个很好的矫正,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好的学术基础。

以历史学为基础: 深挖“北京经验”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西方游记汉学,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毕竟大多数是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西方人深入中国社会,开始从思想和精神上了解中国还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传教士汉学区别于游记汉学的特点在于,这些来华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生活,不少最终老死于中国,对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礼仪之争以后,各教派为了阐明自己传教路线的正确,开始研读和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从而开始了中西思想与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这些是游记汉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欧阳哲生所提到的“北京经验”,就是这些来华传教士和遣使在其汉学著作中对北京和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不已如指掌,但大体不差。”

当下学术界一些人受萨义德



利玛窦与徐光启

资料图片

《东方学》的影响,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称为“汉学主义”,尤其是对于传教士汉学批评颇多。平心而论,来华传教士来中国的确是为了“中华归主”,但殊不知宗教传播是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文化交流中。持“汉学主义”观点的学者,在面对西方汉学时,他们的出发点是跨文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

作为历史学家,作者没有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展开比较文化分析,而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认真梳理了西方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认识的实际推进。作者认为,来华的西方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都有了深入的了解。知识论的推进与跨文化立场是西方汉学家建设这个学科的



传教士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中描绘的荔枝树

资料图片

两个车轮,我们在面对西方汉学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了解其对中国实际知识的掌握程度,其知识表述是否完善,是展开跨文化分析的基础,那些看起来分析得云迷雾地

的文章,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大都是雾里看花。历史学是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此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

该书在思想上也有所关怀。因为近年来关于19世纪西方为何胜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有热烈讨论。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关于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正如戴逸先生所说:“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作者对18世纪中国潜伏的危机给予逐一总结性分析,但话锋一转,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中国衰败的原因归于传统政治制度,将其视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给予了另类的回答。作者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些国家“传统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作者回到自己长期耕耘研究的近代史中,把16至19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与19至20世纪的中国研究贯通了起来。

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涉及中国和欧洲双方历史演进的重大学术研究领域,在历史文献上涉及多种欧洲语言和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这些文献对中国介绍、传播和接受是展开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看来,欧阳哲生的著作是年轻学者未来迈向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的一个重要台阶,该书所代表的学术进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教授)

《守望传统的价值》
陈来 著
中华书局



《考工记》
王安忆 著
花城出版社



《秦直道》
王子今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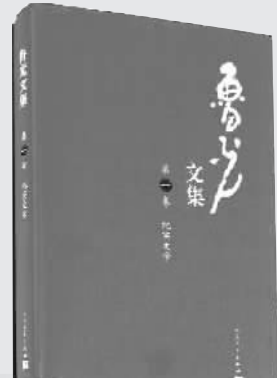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欧阳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
王宁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鲁光文集》
鲁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
齐东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
孟繁华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达斡尔族通史》
孟志东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听化石的故事》
王原等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光明书话

鲁光的真实与真情

——《鲁光文集》述评

□ 张占鳌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鲁光文集》,收录了著名作家、画家鲁光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获长篇散文奖的《世纪之战》,获冰心散文奖的《近墨者黑》等作品。文集还收录了鲁光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打开珠峰的“北大门”》《东方的凡高——崔子范传》《羽坛名将的主旋律》等。

鲁光自称是“低产作家”。对于一位非专业作家来说,这350万字的七卷本文集,实属难得,是他爬了大半辈子格子来之不易的文学作品。他自喻是一头牛,勤奋又个性十足的牛,一生耕耘着自己的一方文学园地。对于文学创作,他的写作经验有四勤:眼勤、腿勤、脑勤、笔勤。厚厚的文集,就是这“四勤”的成果。纵览文集,无论纪实文学,还是散文、高扬的都是爱国主义主旋律,记述了体育界、文化界人士的拼搏奋进精神,其特色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真实、真情。

鲁光是记者出身,最懂得真实的重要。他认为,真实是文章的生

命,真情是文章的灵魂。他写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写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写中国女排打开世界冠军大门,写原国家体委的历届领导,他也写了体育馆路的来历。他真实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体育界的曲折与辉煌,他的文集,堪称半个世纪中国体育史的生动记录。

为了这真实,他远赴西藏,在珠峰大本营与登山队共同生活;他深入乒乓球名将和众多体育界人物;他深入柳州女排训练基地探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的一篇篇杰作由此诞生。在原国家体委工作的几十年,他与历届领导都以诚相待。时至今日,他与许多交往过的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这些真实,无一不是他生命的写照。

创作《踏上地球之巅》时,为了弄清通往珠穆朗玛峰峰顶最后几十米路程的情况,他找了九位登顶的队员采访。由于高山缺氧,登顶者当时大多处于昏昏然状态,几乎一个人一种说法。他只好将每个人提供的线路做对比,理出比较一致的说法,然后再一个人一个人地

去核对,直到多数人取得共识,才写进书里。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审阅文稿时,不禁赞叹:“这段路程,你弄得比我们自己也清楚。”

鲁光又是一位作家。他以“文学即人学”为理念,写人,写人的真性情,而且他擅于捕捉细节去表现人及人的内心世界。综观文集,他主要是写了两类人物:一是体育界的人物。笔触所及,从国家领导人到运动员、书画家,共有数百人之多。

他写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注重细节描写,有血有肉,简约生动。写赛事,省略竞技过程,突出人物在拼搏中的精神境界。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世界冠军,抑或是有名望的大书画家,都是生动鲜活。如写女排主攻张蓉芳,因队里有郎平和孙晋芳,为了顾全大局,到了即将退役尚未得道“全国十佳运动员”。鲁光著文《投她一票》,为她拉选票。李宁是多次体操世界冠军,但在汉城奥运会时却因成绩不佳遭到舆论谴责,鲁光发表了《你理解李宁吗》,为他鸣不平,为他说话

道话。这显示了一个记者、作家的职业道德,他的心里自有一杆“公平秤”。

书画界人物,如齐白石大师,伯乐徐悲鸿,好武豪气的李苦禅,为人入骨三分的李可染,文集中都有出神入化的精彩描述。李苦禅大师83岁时,竟然与他品酒侃聊人生;他的恩师崔子范毫无保留地将绘画的奥秘传授给他。这些惟妙惟肖的细节,朋友之间的真情,构成了文集的灵魄。

鲁光不是专业作家,文学创作都是业余的,是繁忙工作之余的产物,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写作《中国姑娘》7万多字,他自己规定一天写3000多字,晚上写不完,就凌晨写,天天写,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定稿。创作《中国男子汉》,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闻鸡即起。为创作《东方的凡高——崔子范传》,他苦读了大量有关绘画史、艺术史的专著,拜师学艺,积累数年,终成名作。为了《近墨者黑》这部艺术专著,他经常抽空观看书画名家挥毫,与他们聊天谈艺,积跬步以至千里。

鲁光前半生当记者,做作家,

以写作为生。后半生,他又钟情书画,沉醉丹青。他说过:“文学是一个苦海,绘画也是一个苦海,从写作移情丹青,是从一个苦海跳进另一个苦海。”但他苦中作乐,快乐地在苦海中遨游。为了画出自己心中的牛,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牛,他都会走不动路,痴痴看上很久;学习简笔画写意牛过程中,他不知废了多少纸,直到画出了几个自己比较满意的造型;为了画出更现代的牛,他借用一个裱画店,倒腾三天,终于如愿以偿。

鲁光已年届八十二,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他未曾停步,又写又画,写累了就画,画累了又写。他说,自己找事做,自己找快乐。

鲁光记录了当代体育的跌宕和兴盛,当代文坛趣闻轶事,当代书画艺术名家的生活。他的真实、真情贯穿于这些记录中,留存于《鲁光文集》里。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浏览《光明阅读》公众号内容,请扫描二维码。